

也談“身份焦慮”與“編輯學者化”

劉 石

《清華大學學報》2018 年第 2 期發表《如影隨形：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2 期同時發表《編輯學者化：何以討論了三十年》一文，以“編輯身份焦慮”為考察軸心，對四十年來學術期刊尤其是高校學報的生存發展與演變狀態進行了相當學術化的梳理，是朱劍教授多年來系列期刊研究的最新力作。可以說，今後的人們回顧當代期刊研究史，一定不會繞過朱劍教授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將會在相當長時期內給人們以啟發。這裡僅就“編輯身份焦慮”、“編輯學者化”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略抒己見。

文章中提到 2015 年肇慶學院學報編輯部董娟發表的《編輯學者化的歷史語境考察》提出了主體性焦慮說，朱劍教授解釋為身份焦慮，這種解釋相信是符合“主體性焦慮”的原意的。朱劍教授進一步引用他人觀點，認為編輯的職業化與編輯的身份焦慮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並分析認為，建國前後編輯雖然不少，但大多不是職業編輯，而現在則相反，大多數編輯是職業編輯，編輯的職業化使得職業焦慮從而產生。

我理解，朱劍教授所謂“職業”的含義是“專職”。但編輯作為一門“專職”，至少在現代報刊業和出版業形成的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就應該開始了，即使專門就學術期刊業而言，是否如文章所說，在 1988 年新聞出版署《期刊管理暫行規定》出台，明確規定“有健全的編輯部、有符合本專業要求的專職主編及一定數量的專職編輯”，學術期刊編輯才“告別了編研一體而正式走向職業化”，就是說，編輯職業化的時間是否如此之晚，這樣的判斷有沒有統計學上的依據、事實上好不好統計，都似乎值得再探討。

更關鍵的問題是，提出編輯學者化的歷史語境是不是編輯職業化帶來的身份焦慮呢？還有，編輯這一職業有沒有身份焦慮？如果有，是何時，是什麼焦慮？

較早提出“編輯學者化”這一命題的，朱劍教授文中已經引及，是胡光清先生發表於 1984 年初的《試論編輯的專業化與學者化》一文。那麼就算編輯職業化加劇是 1988 年以來 30 多年的事吧，這 30 年來的學術期刊編輯如果說有身份焦慮，又是以什麼時間段為最甚呢？是胡文發表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期嗎？恐怕不是。

遠的不說，新時期以來，年資稍長的編輯和學者可能都有體會，在相當長的時段裡，相對於學術界人員數量和成果產能的充裕，出版界和期刊界的資源相當匱乏的，出版社和期刊社的學術編輯不僅是與學術界最緊密的職業，也是學術界最倚重的對象。說他們被學術界視作天之驕子也不過分。猶記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上，學術期刊編輯往往會受到特別的尊寵和禮遇。由於供需關係的嚴重不平衡，受寵的不僅是名刊的編輯，而且幾乎惠及所有的編輯。在那個年代，身份帶給編輯的其實不是焦慮，恰恰相反，是驕傲，甚至驕縱。

朱劍教授說，“越來越剛性化的學術期刊編輯職業化”造成的身份焦慮導致了“編輯學者化”的提出。其實任何一個稍微體面或正規一點的職業（更何況是編輯這個職業），很難想像其從業人員會集體因職業化而焦慮，所以我寧願反過來，將“編輯學者化”看成是期刊界在推進自身職業化進程中的理論探索，是合乎歷史邏輯的正面主張。

要明瞭這其中的歷史邏輯性，有必要回顧一個不得諱言的事實，即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高校學報，如同高校圖書館、出版社一樣，似乎成了高校安置關係戶的方便去處。總體而言，相較於一線教研人員，學報編輯的學歷和學力普遍較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為了學報的正常發展，有必要在編輯自身學術水平上下功夫，這似乎才是“編輯學者化”主張出現的歷史語境。雖然“編輯學者化”的主張最初非出自高校編輯之口，但正如朱劍教授的梳理所指出，“在各界‘學者化’討論已漸趨冷的1988年，蘇州大學學報編輯部王英志以《學報編輯學者化略論》為題，在學術期刊界也是高校學報界率先提起這一問題”。為什麼由學報從業者再提起這一問題，深層的原因或許正在這裡。

“編輯學者化”是編輯自身建設中的一個正面命題，它的提出亦確實體現著合理性，包含著必然性，這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是它不脛而走、廣播人口的根本原因。但“編輯學者化”的主張客觀上對編輯的職業提升或者說“主體意識”的養成是否起的是積極作用，這恐怕是一個很難證實或證偽的事。不過，如果要給這一主張一個總體的評價，我的評價卻是消極的。

假設我們承認學術刊物的編輯是一種職業身份，那麼一種職業得以成為一種身份，裡面得有多少職業的素養等著去講求啊，比如對學術動向高屋建瓴的瞭解和敏感、對學術重點舉重若輕的分析和把握、對學術發展未來的預測以至引導、得體的人際交往能力與廣泛的學術人脈、學術文章寫作技巧方面的高人一籌等等。學術刊物的編輯當然離不開學術，一定的學術素質當然不可缺乏，專業的學術水平卻不是最重要的條件，更不是唯一的條件。將之單獨提溜出來加以強化，於絕大多數的編輯個體不見得切合實際，於編輯這門職業更可能不僅無補還會有礙。有什麼害呢？此前已經有不少研究者提到過了，如朱劍教授文章所引的，“導致職業角色錯位”、“導致編輯意識削弱”、“導致編輯不安心於本職”等，一句話，這一命題的提出，很容易導致編輯“主體意識”的降低。一種堂堂正正的職業，如此堂而皇之地提出要另一職業化，除編輯一家之外，似乎未見別家。

但編輯不能提倡學者化，我還有另外的一種理由。學術刊物的編輯要具有一定的學術水平本是不言而喻的，但這與學者化不學者化不是一回事。學者化多半是專業化的，在今天的教育模式下養成的學者更是如此，所謂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即“精微”是也；有人戲稱博士的名稱應改成專士，良有以也。而編輯應該是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所謂“廣大”是也。編輯某一專業的學術水平過高，必然是這一專業學者們的大不幸。錢鍾書生前最聽不得別人稱他為比較文學學者，甚至不承認中國有比較文學，原因很簡單，他根本瞧不起他那時的“比較文學”圈子。那麼如果讓他來作編輯，能入他法眼而僥倖見容的比較文學論文會有幾篇？一個刊物聚集了幾個錢鍾書，這樣的刊物還辦得下去嗎？有人說一流的學者只能由二流乃至三流的學者來培養，同理，一流學者的文章恐怕也只能由具有二流乃至三流學術水平的編輯來編發。

如果說，編輯學者化的提出有其歷史語境下的合理性，那麼在今天，期刊界從業者的普遍學術水平並不低，至少在職業的起點上，他們的學歷和學力是不輸於同期起步的專業學者的。如果說在後來的發展中有所不同，那也是道不相同、術有專攻、自主選擇的原因。因此，“編輯學者化”

的提法逐漸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到如今幾乎變而為一個編輯學史研究的題目了。

“編輯主體意識”說出自提出“編輯學者化”的同一人，朱劍教授的文章中業已提及，最早提出“編輯學者化”的胡光清先生，兩年之後的1986年又提出了“編輯主體意識”說。假設說編輯學應當成為、可以成為、已經成為一個學科，那麼在這個學科中，迄今為止包容性強、建設性意義大的命題之一，竊以為就是“編輯主體意識”說，因為它體現了最強烈的專業意識。而就較早提出這兩個命題的胡光清而言，他對於這兩個命題的邏輯關係是有清醒認識的，那就是他所說的“編輯以編書為天職，談論學者化問題，似乎大言不慚”。正如朱劍教授所分析，“他是有著強烈的編輯與學者職業分野意識的，故從提出‘編輯學者化’之始，就對此保持了足夠的警惕”。胡先生是因為“考慮到自身素質與書稿質量、出版事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又不能不探討這個問題”，這也是我自覺有充足理由將他提出的“編輯學者化”看成是他編輯專業化、學科化理論探索中的一個積極命題，而不是因自矮身份而欲去編輯化的所謂“身份焦慮”的表現。

可惜的是，“編輯主體化”與“編輯學者化”這兩個邏輯層面、思想內涵、價值意義都迥不相同的命題，不知什麼原因（不會是因為語法結構過於雷同吧），竟然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被後人相提並論甚且推重後者甚於前者了。

編輯主體意識的體現，我的理解也就是編輯專業性的體現，這種專業性，又有更通俗地稱為編輯獨具的特殊本領。朱劍教授文中便提到，早在1980年第2期的《出版工作》上，熊向東先生就發表過《編輯的本領》一文，“提起編輯，有人就想到抄抄寫寫，剪剪貼貼，因此譏之為‘編書匠’，這當然是一種誤解。其實，編輯工作是一種特殊的本領，而學到這些本領是很不容易的”。那麼，這些特殊的本領有哪些基本的方面，如何才能為編輯所掌握，自然是編輯學研究最重要的問題。可以說，編輯專業性所體現之處，也就是編輯學值得研究的問題所聚集之處。朱劍教授文中提及編輯的身份建構問題，我理解身份建構的核心內容也就在這些地方。道理很簡單，身份而需要建構，那就一定不是一個簡單的外在符號，而是內具的有異於其他職業的特殊素質。既往的編輯學研究者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對高校學報的功能職責、運行體制、管理模式等亦發表了很多建言，朱劍教授行文中既隨加徵引，他自己在包括這兩篇文章在內的一系列文章中亦多有闡發，但茲事體大，仍需要在這一方向上繼續深入研究。

最後再回到“身份焦慮”的話題。今天包括高校學報在內的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倒確實是存在的，這緣於學術期刊的生存困境，這種生存困境大約是近二十年左右的事。隨著政府對高等教育日漸增大的投入，學者們的社會地位隨經濟地位日漸上揚，出版社和社會期刊界卻越來越被趕上市場化的不歸戰車。出版社的市場化在近二十年前的改制後最為明顯，出版物學術水平的要求相當程度上讓位給了急迫的利潤需求。而在作者這一方，則是財（不是才）愈大氣愈粗。給錢出書，出版者與學者的關係變得有點像原始社會以物易物般單純。編輯的地位漸趨下降，八十年代以來持續多年的優越感明顯稀釋了。

高校學報的市場化壓力表面看似乎好些，其實存在更嚴重的問題。在大部分高校，學報本來就是邊緣化的機構，劃歸教輔系列，其歸屬隨著永在路上的人事改革和機構變動而變動。職稱評定、福利待遇等方面的狀況與一線教研人員相比有或大或小的差距。這樣，刊物收費或一刊兩制（名人免費以撐門面、不知名的作者收取版面費）的現象就難免相當程度地存在，問題是經濟上的些許補償不見得能夠減少多少身份落差帶來的心理失衡，收費還加劇了刊物在學術界甚至業界的不良口碑，導致其良性發展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更多屬於編輯個人的身份焦慮之上，還有更為整體的期刊界的職業焦慮，那就是大環境下刊物的生存問題和發展前景問題。現如今高校對教師成果的考核方式是刊物分級制和量化考評制相結合，追求數量必然導致質量的下降，追求刊物等級必然導致大量不夠等級的刊物優質稿源的減少。同時，這也必然催生了刊物升等晉級的迫切需求。如果說現在的學術是項目化，學者是名頭化，學術刊物則是級別化。南大核心、北大核心、中科院核心、社科院核心、權威核心、重點核心，是哪一序列的核心，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刊物生死存亡的關鍵。本來提升刊物品質的正確途徑只有一個：質量為王。優質再優質的稿源，下載率、引用率、轉載率、影響因子全應因它而產生。但優質稿源既不易得，非學術化行為甚至造假行為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比如，刊物之間彼此約定的互引，比如為增加發文量（發文量與二次文獻轉載率成正比）而多發短文，又比如少發甚至拒發某些不易被轉載的學科的文章。有一家省屬大學學報的主編就曾公然對我說，為了轉載率，一律不發表文獻考據類文章。這些行為通常被稱作不講職業操守，其實換個角度看，不就是生存壓力的體現？生存壓力不就是最大的職業焦慮嗎？這與個人的身份焦慮相關連，但更關乎整個編輯行業，焦慮和解決焦慮採取的措施帶來的危害性，又比個體的身份焦慮大多了。

事情還不止於此。現而今的中國高校紛紛爭創世界一流，那麼與高校皮毛相依的高校學報還能坐得住嗎？與學術痛癢相關的學術期刊還能坐得住嗎？首先應聲而動的是科技類期刊。據報載，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已為此組織了“我們與世界一流期刊的距離還有多遠”為主題的系列座談會。可是在我看來，提出科技期刊的一流，比提出人文類期刊的一流還不靠譜。原因很簡單，科技水平是有國際通用標準的，不像人文社科國別和地域差異性，還可以用“凡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來搪塞。我們的科技水平在不斷進步這是事實，但與世界一流之間的距離，通過近期的“中興公司”事件，應當領會得十分清楚了。刊物是引水之渠，文章才是源頭活水。源頭沒有活水，渠水何得清澈！

科技期刊如此，人文學報何獨而不然！在2018年4月底澳門理工學報召開的“華文學術期刊轉型暨《澳門理工學報》創刊二十周年研討會”上，明明討論期刊的問題，來自高校的多位教授卻紛紛嗟歎高校學術管理制度的荒謬、學者學術道德的低下和學術水平的滑坡。這不是跑題，高明的國醫不會止於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他們綜合辯證地看出了學術期刊的最大困境是水缺源，木無本。十多年前，李伯重教授的大學學報“學術垃圾生產地”說一出，輿論一時譁然。但大學學報淪落至此，是大學學報編輯不夠學者化嗎？不夠學者化的難道不是垃圾生產者嗎？就像有安全問題的食品端上了桌，你去怪廚師，講道理嗎？所以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種儘量杜絕垃圾源頭的機制。將這種機制推後到垃圾產生後處理垃圾的學術刊物，為時未免已晚，再將責任歸之於編輯的不夠學者化，更是治病開錯了藥方。

對學術的理解和敬畏，是學術界和期刊界共同保持學術綠色生態的底線。失去了這條底線，一切將無從談起。從這個角度講，身份焦慮豈止是期刊界才該有的，期刊界所依託的學術界，更大有值得焦慮之處。學術界和期刊界更應由焦慮到質疑，質疑自身，也質疑自身所在的職業體制。朱劍教授近年來關於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的系列思考，作為“清華學報·獨立精神叢書”之一種，結集成《霧裡看花：誰的期刊 誰的評價》一書，甫一問世就在學術界和期刊界引起不小的反響。誰又能說，這不是焦慮和質疑所創造的價值呢？

（作者係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清華大學學報》副主編，教授）

[責任編輯 劉澤生]